



史學叢書系列 25

閻沁恆 著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史觀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史觀

閻沁恆 著

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史觀 / 閻沁恆著. --

再版. -- 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5

面；21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986-7862-83-X（平裝）

1. 湯恩比(Toynbee, Arnold Joseph, 1889-1975)

- 學術思想 - 史學 2. 史學 - 英國

601.98

94025754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史觀

作 者：閻沁恆

出 版：稻鄉出版社

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美原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18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86 年 4 月

再 版：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I S B N：986-7862-83-X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閻著《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史觀》序

杜維運

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是20世紀享盡天下大名也受盡史學界猛烈攻擊的英國史學家。他傾30年歲月寫成的12冊《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出版於1934年至1961年之間, 撰寫則自1927年開始, 至1954年寫成)巨著, 被認為是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ism)方面的作品, 除了為一有紀念性的珍品(a monumental curiosity)以外, 將不可能再留下什麼。其精心發現的「挑戰與反應」(challenge and response)之說, 「引退與復返」(withdrawal and return)之論, 沒有人去相信。後起的英國史學家, 尤喜攻擊這位前輩史學家的好高騖遠, 所據史實欠精(factual inaccuracies), 甚至說他不是史學家, 而是哲學家。可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他的聲譽, 自英倫三島, 洋溢寰宇。在美國, 他變成大眾人物(a public

figure)。在中國，史學界人人知曉其人(縱使不知其學)。其書暢銷世界各地，為出版商的營利保障。英國、美國、加拿大較具規模的新舊書店裡(近三十年我逛過不少此類書店)，《歷史研究》一書橫陳。受攻擊如彼，被崇拜如此，什麼因素促使湯恩比變成如此兩極化的人物呢？

「名滿天下，而謗亦隨之」的解釋，不是十分適切的。史學潮流的衝擊，世界局勢的演變，應是最關鍵性的。湯恩比生於其間，惻然而動悲天憫人的胸懷，他恐懼西方文化將導致世界毀滅，原子武器或盡殲全球生命，於是衝破國家民族的藩籬，從西方關注到東方，從世界出現過的三十幾種文化，窺探人類歷史的全貌，而且從人類的開始，迄於當代，這是哲人的胸懷，世界性的眼光，大史學家的風采，無過於此，世界各地，怎能不愛戴這位史學家到如醉如狂的地步呢！這是世界局勢的演變促使湯恩比得享天下大名。而且他甚為博學，極為勤力(infinite capacity for hard work)，有驚人的記憶頭腦(他自述對2-30年以前所作的割記資料，猶能應用，這證明他記憶力的持久，其夫人稱他有第六感(見 *Toynbee on Toynbe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52)，具豐富的想像天賦，天又假年，其譽滿天下，遂不足怪。然而他立於西方史學潮流之外，19世紀初葉以後百餘年的西方史學發展，客觀謹嚴的治史方法，臻於極致，求真探微的寫史態度，成為時尚，專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s)群趨於選擇極小

的研究範圍，以作細緻深入的研究，研究範圍以外的世界，不去聞問；歐洲以外的歷史，視為洪荒未開，不予理睬。以致歷史研究，呈見偏狹與見樹不見林的現象。歷史的貫通與寬廣不見；中國、印度與伊斯蘭文化，同樣是世界歷史遺產，而不得與歐洲文化並列；史學家所殷望與沾沾自喜者，為有一天能獲得歷史真理(historical truth)。史學潮流如此，今突有湯恩比其人，以數千年的世界史為範圍，馳騁其間，尋覓人類歷史發展的定律與奧秘，蚍蜉不自量力，無怪史學界愕然，譁然，群起攻擊其缺陷，而欲將他逐出史學門牆之外了！

歷史須真，求真是史學家的天職，惟不是史學家的唯一美德。歷史事實的不盡精確，是無法避免的。全真的歷史，祇能在史學家的夢境中出現。史學家慈悲的胸懷，浩瀚的思想，寬廣的視野，精細的方法，與近真的歷史事實結合，人類的良史，才悠然出現。如此以言，湯恩比有其缺陷，也具備大史學家的條件，以卓越史學家許之，應為公允。

老友閻沁恆兄酷愛歷史，兼及中外，尤喜探研湯恩比的史學。1970年遠赴英倫，長時期潛心大英博物館，苦讀湯恩比50種以上的作品。歸國後寫成專文八篇，今輯為一書，名曰《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史觀》，而囑我為之序。

我與沁恆兄治史蹊徑相似，而氣象的恢宏不及。沁恆兄從世界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開始，我則局促於史學理論與方法之間，以至老友深喜史班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與

湯恩比之書，我則偏愛柯林吾(R. G. Collingwood, 1889-1943)與蒙彌葛廉諾(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的著述。近年已覺自己器小，而改變不易。今老友出書，興奮之情，筆難盡宣矣。

治史以外，沁恆兄與我，命運與愛好也相同，同是同學，同是政治大學歷史系授業的教師，而且又是四十年以上「酒食徵逐」的朋友。在史學圈，較老一輩的，有所謂三酒客，是指我與沁恆兄，陳捷先兄三人，以實力排名，沁恆兄居首，捷先兄次之(有時竄升)，我是永遠的「老三」。這與清乾嘉時代趙翼詩名永遠排在袁枚、蔣士銓之後一樣。人生有命如此。

沁恆夫人林瑞炳女士，是北一女中馳名的歷史老師，與內子孫雅明友情其篤；其公子愷晉、其小女愷林，與宗騏、宗蘭又時相過從，通家之好，當之無愧，隨述於此，以傳佳話。

中華民國86年3月 杜維運 序於台北市看山樓

自序

有一天我的兒子愷晉突然問道：「我在家裡的書櫃中看到很多熟知教授的著作，為什麼獨未見您寫的書？」這一突兀的問話，正是觸及我的弱點。因為除了在大學任教，早期出版過幾本書之外，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都身兼一些學校行政工作，除了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較大型的專論及專書便無暇作長期的投注，自然就沒有成果。

經過二十餘年專注於史實方面的鑽研，對於自己從事歷史研究的層次與領域便希望有所提昇與擴大，所以就把閱讀學術論著的範圍和日常思考的重心轉移到文化史與歷史哲學方面，和湯恩比的著作結緣就這樣開始。之後，1967年湯恩比到台北訪問，有關的新聞報導和專文介紹刺激了我去作更進一的努力。1970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核准資助赴英國研究湯恩比的史學，使我能順利的實現了一個學術的夢想。

人生最大的敵人是好高騖遠，我不巧中年以後也犯了這種大忌，一心想突破自己，追求卓越，闖出一片天來。於是三十年來寒窗苦讀，偶然也會廢寢忘食，寄望於頓悟學術之大道，而著書立說，以成一家之言。不但閱讀一些比較艱深難解的書籍，而且常常思考史學上若干複雜的問題，嘗試尋找其答案。如此像唐吉訶德式的愚行在學術界行走不免眼高手低，事倍功半。我對於自己的抉擇並不滿意，只是有悔之晚矣之憾。當我整理文稿準備印行這本書的時候，不免感觸很多，有些抱怨，也有些自責。

國內學者研究湯恩比學說的風氣並不怎樣盛行，牧童出版社在1976年出版《湯恩比與歷史》文集，林綠教授和陳曉林教授對《歷史之研究》的節縮本分別各有中文譯本問世，最近又拜讀汪榮祖教授載於《歷史月刊》的〈湯恩比的大歷史〉專文，都為想要瞭解湯恩比史學的人提供了方便和指引，但是正如姚從吾教授在世時的名言：「不讀原文就品嘗不到原味」，討論湯恩比的方法、史觀以及糾正他的錯誤和批判他的缺失，需要從他的十二冊《歷史之研究》中直接與完整的先瞭解他的本意，才不致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尤其批評他的人固然不少，讚賞他的人並非沒有。如果只看那些一面倒的文章然後據以論事，便失去史家應遵守的持平與均衡的原則。

本書總共包括六篇論文和兩篇置於附錄中的文章，其中

除了〈史班格勒與湯恩比的文化史觀之解析〉是最近完成從未發表之外，其他諸篇分別在學報或期刊上刊載過，唯〈湯恩比其人其事〉一篇，因事隔二十餘年，而且爲了適應登載刊物的體例，沒有立註，都有增補修正的必要，所以其中有些部分均經重寫過，應該視爲半新半舊的文章。

湯恩比的著作五十餘種，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蒐藏完整。我爲了遍覽所著，曾經久居倫敦，早晨排隊進館，下午四時許出館。1970年代初期，尚無遍置之影印機可用，要用的資料需要打字或手抄，所以頗爲耗時。該館蒐藏豐富，服務週到，給我的方便和幫助，在此表示感激及謝意。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時任歷史系主任的勃朗姆萊(John S. Bromley)教授的關懷備至與有教無類的熱心指導，令人長記在心，化爲自我惕勵的一股動力。他比喻自己的脾氣如倫敦的天氣，雲霧濛濛，變化無常，其實他除了討論學術時疾言厲色，捉摸不定，平常亦很慈祥和諧。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林能士主任、前主任張哲郎教授和吳圳義教授的關切及深誼，使我銘感在心。彭明輝教授和吳翎君教授夫婦給我工作上的分勞與幫助，減少我很多的負荷及憂慮。妻子林瑞炳女士奉獻我們的家庭四十餘年，不只生活上互相依恃，學問上也是諮詢討論的忠實夥伴。這本書的出版，她的催促和支持，功不可沒。好友杜維運教授慨允賜序，且文如其人，揮灑自如，才識過人，爲拙著增色很多，

在此深致感謝之意。

閻沁恆 謹識 1997年3月15日

目次

杜維運序.....	i
自序.....	v
1.湯恩比其人其事.....	1
2.湯恩比的史學方法及觀念.....	9
3.史班格勒與湯恩比的文化史觀之解析.....	43
4.湯恩比看中華文化的成長.....	77
5.湯恩比論早期美國歷史.....	93
6.湯恩比的文化憂患說.....	119
附錄：	
(1)湯恩比與當代思潮.....	141
(2)湯恩比論中華文化.....	147
徵引書目.....	157

1

湯恩比其人其事

史學巨星的殞落

1889年4月14日出生在倫敦的英國史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於10月22日與世長辭。這恐怕是自英國哲學家羅素逝世後另一件震撼學術界的不幸消息。湯恩比一生從事教學、公職、研究以及著述工作，在事業上一帆風順，在生活上由小康而至於富有，以旁觀者看來真是功成名就，了無所憾。然而，他目睹大英帝國的由盛而衰，親歷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對於軍國主義的方興未艾、人類精神文明的匱乏、世界文化前途的陰影等一類的問題憂患重重，耿耿於懷。由此觀之，則又似志猶未竟而遽歸道山。

湯恩比這顆史學巨星的消失，對於熟知他本人或他的著

述的人都感到深淺不同的哀傷。因為他曾使用可資利用的媒介去傳播知識的「福音」，對時代作了明顯的有力反映，是少數世紀的發言人之一。他的12冊巨著《歷史之研究》雖然在學術界引起激烈的爭論，書中隨處散放的智慧光芒仍然受人珍賞。在將近20年的退休生活中，他完成了十餘部新的著作，寫過篇數極多的專論，同時還經常作廣播學術演講。退而不休，老而彌堅，正是他晚年歲月的真實寫照。這位曾被視為宗教的知音、學術界的奇兵、史學界的「叛徒」、共產無神論的剋星以及出版界的「搖錢樹」雖然結束了他在塵世間八十六年多的旅居生涯，他的學術貢獻和精神生命，或可伴隨人類文明演進的軌跡，繼續朝向終極的目標運轉前進。

好學深思敏於觀察

湯思比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曾祖務農，祖父為醫生，母親為一歷史教師。在回憶中，他認為母教的啓迪對他以後獻身史學研究的影響很大¹，而曾在海軍服務的「哈利叔叔」旅遊各地的見聞故事更增加了鼓舞的作用²。以他家庭的財力和地位本來無法進入當時貴族化的一流學校，但他卻經過嚴

¹ William H. McNeill, *Arnold Toynbee: A Lif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9; 11-15.

² Arnold J. Toynbee, *Acquaintances*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1967), pp. 12-13.

格的考試，在10歲及13歲分別獲得獎學金到有名的沃頓(Wooton Court)學校及溫徹斯特(Winchester)學校就讀。小小年紀離開父母到校寄宿，接受嚴格的舊式教育，當時他感到十分的困惑與難解。然而成年之後，才體會出自幼奠定拉丁文、希臘文以及哲學知識的基礎是怎樣的有益處。日後他的其他的觀念雖常受批評，然則對於希臘、羅馬史的精深研究卻無人不欽佩。此與這段受教育的經過是密不可分的。

在溫徹斯特修業五年，湯恩比又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另一獎學金，進牛津大學巴利爾學院(Balliol College)³攻讀。1911年當他22歲時卒業，第2年起即在巴利爾任研究員兼導師，專治古代史。歐戰爆發後給這位年輕的牛津史家感觸極深。1915年之後曾擔任與戰爭有關的政府職務五年，也曾是出席巴黎和會英國代表團的一員。1919年榮膺倫敦大學講座教授，主授東羅馬及希臘文史。他的《歷史之研究》的寫作計劃即成型於此時，同時也開始主編《國際事務調查》(*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他的時事論述經常出現，是一份極具價值的重要刊物。1925至1943年湯恩比任職皇家國際事務局，同時擔任倫大國際事務研究教授，1943年起他在英國外務部任職3年，1946年再度出任英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1955年辭去倫大講席而退休。由於他對國家的貢獻，受封為榮譽侍從(C

³ Balliol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創立於1263，為牛津大學最早誕生的第一個學院，學術聲譽卓著，為青年學子所嚮往的頂尖學府之一。

H.)；由於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亦受推選為英國學術院院士(F.B.A.)⁴。

與史學界的恩怨

湯恩比的史學巨著《歷史之研究》的前3冊出版於1934年。1939年另3冊問世，1954年7至10冊出版。1958年出版第11冊，是歷史地圖及地名註釋；1961年出版第12冊，係前10冊內容的修正及對批評者的答覆。關於他這部廣為人知的著作，數十年來確實引起許多不同學科學者的爭相議論。概括而言，在史學界以外所獲得之評價高於本行的學者：亞、美等洲受到的讚譽遠比他本國及歐洲大陸較為普遍⁵。

據《觀察週報》⁶於湯恩比80歲生日時著文的分析，湯恩比與英國以及歐洲史學界的交惡的真正原因有二：一為他的治史方法與當代一般史家所強調者大相逕庭；二為英國學術界泰斗特羅福—羅伯(Trevor Roper)教授曾撰文猛烈的攻擊他的史著⁷。自此以後，雖然他的著作傳誦日廣，聲譽不斷的升

⁴ F. B. A.係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之縮寫，為學術榮銜，僅次於F. R. S.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⁵ 參見汪榮祖，〈湯恩比的大歷史〉《歷史月刊》106期(台北：歷史月刊社，1996年，11月)，82-87頁。汪文中亦詳細論述到湯恩比在北美與亞洲廣受讚譽及在英國與歐洲被嚴格批評的情形。

⁶ *Observer*, April 14, 1979.

⁷ Hugh Trevor-Roper, "Arnold Toynbee's Millennium," *Encounter*, June,

高，然而在英國甚至歐洲大陸，甚少史家願與他有所往來。

在《歷史之研究》第12冊中湯恩比提到的批評者就有三百八十餘人，其中討論最多、批評最激烈的要算荷蘭已故史家海爾(Pieter Geyl)了。海爾的晚年幾乎大部份時間是花費在撰寫批評湯恩比的文章。他認為湯恩比太過主觀，方法也極不謹慎，且超出了史家治學的範圍。他說：湯恩比夠資格做一個詩人、神學家、預言家，但是絕沒有資格自稱為史學家。湯恩比的答辯是：我是對於歷史加以研究，與撰述史實的史家有所不同，正如研究莎士比亞的人與撰寫劇本的莎翁不能混為一談一樣⁸。1948年1月4日及3月7日他們二人曾在英國廣播公司第三台作過兩次的學術辯論，二者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成為史學界一段極富興味的故事⁹。

湯恩比與中國

湯恩比不懂中文，但是透過西方文字有關中國歷史與中

1957; 註5引汪榮祖文敘述詳盡。參見《歷史月刊》106期，85-86頁。亦可參閱Hugh Trevor-Roper, "Testing the Toynbee System," *The Sunday Times* (London, October, 1954).

⁸ Pieter Geyl, "Toynbee's System of Civilizations," reprinted in *Toynbee and History: Critical Essays and Reviews*, ed. by M. F. Ashley Montagu (Boston, Mass.: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1956).

⁹ 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6).